

中国民族史

(上)

江应梁 主编



民族出版社

1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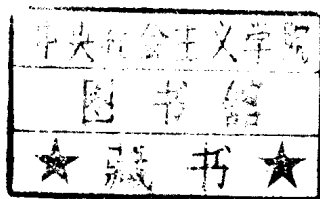
200315845

中国民族史

(上)

江应梁 主编

77326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淑贞

封面设计：李 华

中国民族史

(上)

江应梁 主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405 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定价：4.50元

ISBN 7—105—00811—3/K·60

(汉60)

目 录

上 册

绪 论	1
第一编 先秦时期诸民族	15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远祖	15
第一节 中国境内人类的前驱	18
第二节 前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人类及其文化	20
第三节 母系氏族制时期的民族部落共同体	26
第四节 父系氏族制时期的民族共同体	32
第五节 中国民族的传说时代	45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中国民族的发展	55
第一节 夏族	57
第二节 商族	63
第三节 周代商而兴和西周的民族	71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78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83
第二编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91
第一章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汉民族的形成	91
第一节 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92
第二节 汉代与周边各民族联系的加强与发展	94
第三节 我国主体民族的形成	102
第二章 匈奴	109

2/438/05

第一节	匈奴的来源及其形成	110
第二节	匈奴的经济生活	114
第三节	匈奴的社会结构	119
第四节	匈奴与中原的关系	126
第五节	匈奴的分裂与衰亡	138
第三章	东北诸族	143
第一节	涉貊	143
第二节	肃慎与挹娄	146
第三节	夫余	150
第四节	乌桓	153
第五节	鲜卑	163
第四章	西域诸族	169
第一节	西域概况	170
第二节	西汉与西域的关系	173
第三节	西域诸国	186
第五章	氐羌诸族	201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羌	201
第二节	河湟诸羌	208
第三节	东汉羌人起义	215
第四节	天山南路诸羌	222
第五节	武都氐羌	225
第六章	西南诸族	230
第一节	羌语诸族	231
第二节	越语诸族	247
第三节	哀牢	252
第四节	西南夷与中原的早期联系	254
第五节	郡县与屯田	257
第七章	江汉诸族	262
第一节	武陵蛮与长沙蛮	262
第二节	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	265

第八章	百越诸族·····	268
第一节	百越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268
第二节	于越与句吴·····	271
第三节	瓯越与闽越·····	273
第四节	西瓯·····	275
第五节	南越·····	277
第六节	骆越与乌浒蛮·····	280

第三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及民族之进一步融合

·····	·····	285
第一章	三国时期的民族·····	285
第一节	曹魏与北方各族·····	286
第二节	蜀汉政权与南中民族·····	293
第三节	孙吴与山越的关系·····	304
第二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	312
第一节	对少数民族的双重统治·····	312
第二节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314
第三章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	330
第一节	前赵政权及其衰亡·····	330
第二节	羯族后赵的兴亡·····	337
第三节	冉魏政权的兴亡·····	348
第四节	前燕慕容氏的兴亡·····	350
第五节	氐族和前秦的建立·····	359
第六节	淝水之战后北方少数民族诸政权·····	376
第四章	拓跋鲜卑北魏和北方各族的进步及融合·····	405
第一节	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	405
第二节	均田制与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	415
第三节	北魏太和改革·····	426
第四节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	435
第五章	北朝晚期的政治与民族·····	447
第一节	东魏与西魏的分立·····	447

第二节	北齐政权及其鲜卑化政策·····	453
第三节	北周和北方各族进一步融合·····	456
第六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境各族·····	466
第一节	东北诸族·····	466
第二节	柔然与敕勒·····	473
第三节	西域诸族·····	481
第四节	南方诸族·····	490
第五节	爨·····	502

绪 论

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现已确认的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早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祖国的土地上就已有人类生息。中国各民族的祖先，主要起源于祖国各地的古人类。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兰田人、周口店的北京人、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等，是从二十年代至今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早期人类。

中国各民族的祖先，从七千年前起就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创造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早在传说时代，当炎帝之族与黄帝之族在黄河中游逐渐融合的时候，在北方居住着狄人，以荤粥为强族；在东方则有夷人；南方有包括九黎、三苗的群蛮。舜时的四周，西有戎、析支、渠、氐、羌，北有山戎、发、息慎，东有长夷、岛夷，南有交趾等族。

黄河流域的居民，经历夏、商、周三代，不断吸收周围羌、夷、戎、狄、苗、蛮等族的成分，相互融合演化成为华夏族。同时，东方九夷、东北肃慎、南方苗蛮、西方和北方的氐、羌、狄等族，与华夏的联系日益加强。商代，异族占据的边地称为

“方”，在甲骨文中，“方”以百计。商王武丁时期，四周有三十几个方国，西北有土方、舌方、鬼方、羌方等，江淮流域则有人方、虎方等。周人原在戎狄之间，与羌人中的姜姓部落世代通婚。周武王伐商纣时，曾联合西方和南方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

春秋时期，秦穆公合并十二个戎族酋邦，逐渐强大，曾被称为“戎狄之国”；南方的楚国，合并了四十五个酋邦，其中不少是蛮夷，楚王自称是“蛮夷”之邦；吴、越两国的居民则以越族为主要成分。这是一个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加入到华夏民族之中，蛮、夷、戎、狄也吸收了华夏的文化，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

商周两朝，周围的各族以拥护“天下共主”的形式，和商周结成密切的政治关系。秦统一六国后，置三十六郡，后发展至四十二郡，其版图包括了古代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的大部分，中原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杂居，中国开始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汉承秦制，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开通西域，经营河湟，郡县西南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自秦汉至今，我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为创造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主要研究我国各民族（包括现在五十六个民族和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现在已消失了的民族）的源流；研究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诸方面沿革及其特点；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关系发展变的客观规律。中国民族史包括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族别史，各地区的民族史，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专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内容。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不了解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不能更好地认识她的现状，也难以预测她的未来，也就不能为本民族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有助于正确阐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研究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汉民族的主源华夏民族，在中国古代，仅是黄河流域诸族之一，与蛮、夷、戎、狄交错杂处，并无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分。而且，虞、夏、商、周的先公先王的出身，无不与蛮、夷、戎、狄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春秋时期，华夏民族融合了周围诸族，逐渐形成了比较大的民族。“华夏”便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可以说没有蛮、夷、戎、狄的存在，就没有华夏民族的出现。秦汉的统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以后又几经民族的迁徙、融合，才使汉族成为我国今天的主体民族。有先秦的夷、夏之别，才有秦汉时代汉民族的形成；有魏晋南北朝的胡、汉之别，才有隋唐时期汉民族的发展；有宋、辽、金、西夏的对峙，才有元明清时代汉民族的壮大。因此，不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也就无法深入研究汉民族的历史。第四，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少数民族曾建立过全国性或地区性政权，成为统治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五，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边疆地区，边疆的沿革史是与少数民族发展史紧密关联的。研究少数民族史，对于深入研究我国的边疆发展史，对于开发边疆、保卫边疆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之，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的

历史共同构成的，不研究中国民族史，就无法探索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不能全面而科学地阐述我们伟大祖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浩如烟海的史籍，虽主要是记载汉族的历史，但也有很多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二十四史中有专门记载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四裔传”等类目，《魏书》、《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清史稿》等，记述了各有关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历史。《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地方史志以及古代人的笔记、文集，也记述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少数民族的文献、文物也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尽管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及其史学家们，往往从“尊王攘夷”、“别夷夏、异内外”的所谓春秋大义出发，对少数民族多有歧视，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或语焉不详，或歪曲污蔑，但确实是搜集、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

“中国民族史”这一专门术语是本世纪初出现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国史学界逐渐注意了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并着手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先后出版了林惠祥、吕思勉等人编著的几部《中国民族史》专著。但这些著作大都比较简略，仅只是汇集了有关的史料，并且或多或少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有的甚至宣扬中国只存在“宗族”，不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的错误观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时，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出发，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历史的研究，当时有少数进步的历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于对中国民族史的开拓性研究，曾出版了吕振羽编著的《中国民族简史》、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写

的《回回民族问题》等著作。由于革命战争等艰苦条件的限制，全面、深入地进行搜集和整理、研究我国民族史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全面开展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杂志报刊上刊登了大量的有关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五十多部民族《简史》；许多民族史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很多著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有独到见解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在中外学术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此外新编出版的几部中国通史，改变了以往中国通史基本上是写汉族发展史的旧体例，采用了较大篇幅书写少数民族的发展史，这就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令人深感缺憾的是，建国以来，迄今大陆上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部《中国民族史》。这种状况，与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的地位很不相称，与中国民族史的教学、科研和社会的需要也不相适应。我们作为长期从事民族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成员，深感有责任为中国民族史的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竭尽绵薄之力，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以满足教学的迫切需要，适应社会要求，推动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们编写这部探索性的《中国民族史》以为引玉之砖。

提起编写这部《中国民族史》，我们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昆明，在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应注意地方特点，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我们提出了任务。当年秋季，方国瑜教授即开出《云南民族史》课程。接着，我开出《傣族史》，杨堃教授开出《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云南各民族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与全国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云南民族史是中国民族

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统一在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要研究云南民族史，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不懂得中国民族史，云南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就无法深入。于是，我们从1960年起正式在历史系开设了中国民族史课，并在方国瑜和我的主持下，写成《中国民族史讲义》供教学之用。1964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我们编写的《中国民族史》被列为高教部文科推荐教材，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正当我们着手修订这部教材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被迫中断。这本原应在十多年前就和读者见面的著作，也难逃劫运。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复苏，编写《中国民族史》的工作又重新开始了。1983年10月，我校历史系又重新组建了写作班子，将《中国民族史》列为云南省社会科学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中国民族史》由方国瑜教授任顾问，我任主编。1983年12月23日上午，方先生就《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与我长谈了近两个小时。不虞半小时后，方先生因脑溢血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于第二天上午8时逝世。我们对这位认真负责、谨严纯朴的学者，为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表示无尽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

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共同努力，现在《中国民族史》要定稿付梓了。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本书一定有不少错误和疏漏的地方。这部书公开出版，一方面是希望我们的劳动成果能为中国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求得各方面的教正，以便修订提高，使之臻于完善。

二

研究中国民族史，首先遇到的是关于民族的基本概念问题。我国学术界由于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在使用“民族”一词所表

达的涵义上也必然有所不同。一种是广义的，认为民族一词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即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文明民族；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前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等。而狭义的“民族”是指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与《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两文内所说的民族。它是俄文 *нация* 一词的译名，仅指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而言，一般又称为现代民族。

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时还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①我国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学者们，对此虽看法不一、论见歧出，但在实际研究中又普遍使用它。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仍不失为比较科学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虽然在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其规模、形式和具体内容多有差异，但均具有它最基本的共同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特征，科学地揭示了民族的本质属性，既适用于现代民族，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我们编写这部《中国民族史》正是在广义上使用“民族”这个词的。由于我国古代民族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民族的四个特征，因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尤为注意这四要素的发展程度及其变化。

关于民族形成的问题，在学术界已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争

^①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论，目前仍在继续，短期内尚难以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我国民族形成的时间，主要观点有：原始社会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阶级社会确立时期；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四种观点莫衷一是，但把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准则是一致的。斯大林关于“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论断，是符合俄国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的，但中国的历史发展则经历了一条与俄国、欧洲极不相同的道路，中国民族的形成也必然与俄国、欧洲有其显著的差别。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这种社会结构必然对我国民族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和官僚管理的郡县体制，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维持着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统一的表意象形文字克服了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交流思想文化的共同纽带。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为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创造了条件。以儒学为主、儒佛道汇合的思想文化成为共同意识的载体。在秦汉时期，汉人即已具备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形成一个民族，并长期保持着民族的特征和稳定性。民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形成过程中受着多种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各个民族有其不同的形成、发展模式及特殊性。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国各民族形成时，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从各个具体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探求规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

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民族史经常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列宁对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分别做了说明，他说：“同化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①民族融合，即“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消灭一样，人类只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

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①根据列宁的论述，可知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并有严格区别。

民族同化有不同途径，主要有强制同化与非强制同化两种。强制同化是历史上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统治民族借助暴力和政权，迫使被统治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消灭被统治民族的民族特点，达到一体化。这种同化，在我国民族史上存在过。非强制同化，是落后民族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主动向先进民族转化。非强制同化贯穿于中国民族史的始终。今天的汉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化了许许多多民族成分而形成壮大的。汉族在历史上不断同化其他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增加人口，丰富民族文化，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

民族融合是全世界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中，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是有严格区别的。从我国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人们在运用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这两个概念时，有着较为模糊的情况存在。事实上，在我国民族史上确有民族融合的现象，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固然与同化了多少少数民族有关，但也有民族融合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各民族相互交融汇聚、分化组合的历史现象就难以用民族同化来加以概括，而用民族融合来表述则更为恰当。在撰写《中国民族史》时，我们正是在广义上使用了民族融合这一概念。当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是与将来全人类的民族融合相区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别，因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未来全世界性的民族融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历史范畴。

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边疆地区，正确处理祖国历史上疆域或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是中国民族史上带根本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历史，自秦汉至清朝灭亡，无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无论哪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我国都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各个民族和由众多民族组成之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我国今天的疆域也是历史上疆域长期发展的结果。所以在探讨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疆域时，应与今天的版图范围相区别，不能将其二者相等同。在撰写《中国民族史》时，我们着眼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为历史上的暂时分裂现象所左右，因为祖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有些民族陆续进来，有些民族中途退出，总的来看，我国的疆域大体上是稳定的。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远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上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版图正是从这个传统疆域发展而来的。我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各个民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